

思想拷问

近代中国 历史述论

我们知道世界不可能完美，只是在假说中的天堂才有。人类要不断地创造，不断地改善社会，但新的困难便会接踵而来，许多问题总是不停地发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困难，没有什么进化论可以给予我们安慰。世界复杂得使我们没有一定的理由悲观，也没有一定的理由乐观。在逝去的岁月里，无数志士曾喋血菜市口，流亡海外，抱恨终天；血沃中原肥的只是劲草，没有花，也没有果。21世纪的重要使命是恢复中华文明的元气，必须步入重建文明秩序之路。更需要造就一大批敢于直面思想者第三种命运的思

延边人民出版社

sixiang
kaowen

512

SIXIANGKAOWEN / SIXIANGKAOWEN / SIXIANGKAOWEN

骆晓会 著

近代中苏关系史述论

一九二七——一九四九

延边人民出版社

SIXIANGKAOWEN / SIXIANGKAOWEN / SIXIANGKAOWEN

主 编:陈家桢
责任编辑:安石峰
封面设计:言天舒
责任校对:骆晓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苏关系史述论(1917-1949)/骆晓会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10

(思想拷问丛书;4)

ISBN 7-80648-689-5

I.近…

II.骆…

III.中苏关系-对外关系史-述论-近代

IV.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1207号

近代中苏关系史述论(1917-1949)

JINGDAI ZHONGSUGUANXISHI SHULUN

骆晓会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33000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11号)

株洲开发区英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株洲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5千字

ISBN 7-80648-689-5/C·40 定价(全五册):65.00元

演绎思想者的第三种命运

(主编寄语)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甚至败亡,历史上的例子有的是,但这不是小国就是那些在文化上没必要大书特书的国家,只有中国是个例外。有不少学者一提到历史,都为中国从极盛滑落至极衰的这一千年摇头叹息,感到奇怪也。

任何国家都有起有落,就连美国也曾经有过经济大衰退,可是这些全都不似中国的悲剧之悲——从傲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伦理到腐化入骨。神州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炎黄子孙究竟受到了什么诅咒?

曾几何时,一位摆弄经济学的倔老头儿风吹别调,发出了和百家——其实也就是一家——不同的声音,引发了一场举国围剿运动。这很可怕,让人联想到宇宙不是在膨胀而是在缩小,就像一个涨得紧绷绷的热气球噗嗤噗嗤地往外撒气,眼看快瘪成一个点。人人被迫在针尖上跳舞,尽管不是天使,做不出罗曼蒂克的动作。这倔老头儿不是别个,正是大名鼎鼎的马寅初。大名鼎鼎管什么用,名声徒然为大批判营造出轰动效应。好友噤声,爱莫能助;同事侧目,视若寇仇;学子声讨,不共戴天。为了什么?为了一篇《新人口论》。

大体说来,思想者因其思想各异而有三种不同的命运。一种思想是与潮流同步,因而最功利也最稳妥,尽管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转瞬就有可能化作明日黄花。一种思想是超前半步,属于不乏新鲜也不乏风险的那一类,然而当卫道士们正要抡起大棒申斥之

时,却已被社会前进的脚步裁判为真理。一种思想是领先百家,超越时代,注定要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常常要等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为后来者逐渐认识接受。正是这种遭遇使一批又一批的竖子成名,而使一批又一批的布鲁诺、曹雪芹愤世嫉俗,慷慨悲歌。

中国的文化曾经高不可攀,但尊严也曾跌到无影无踪。对演绎思想者第三种命运的思想者的压制与摧残,是造成中国文化悲剧的根本原因。马寅初之可悲,恰恰在于他的目光超前,其人口理论演绎的是思想者的第三种命运。

清朝末年思想家章太炎认为“善进,恶也进”,即善与恶同时进化。我们知道世界不可能完美,完美只是在假说中的天堂才有。人类要不断地创造,不断地改善社会,但旧的困难才去,新的困难便会接踵而来,许多问题总是不停地发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困难,没有什么进化论可以给予我们安慰。世界复杂得很,我们没有一定的理由悲观,也没有一定的理由乐观。在逝去的岁月里,维新志士曾喋血菜市口,流亡海外,抱恨终天;血沃中原肥的只是劲草,没有花,也没有果。21世纪的重要使命是恢复中华文明的元气,必须步入重建文明秩序之路,更需要造就一大批敢于直面思想者第三种命运的思想者。以此为契机,我们策划出版了《思想拷问》学术丛书。

对于人类的命运——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共存——我们已从人类以往的发展中看出了积极变化的因子,并有理由期待更为辉煌的明天。从经济学的眼光看《思想拷问》或许并不能令人满意,但她至少可以给人们提供思考的素材,并试图把思想之火注入到研究中去,使那些即将成型的研究成果真正灵魂出壳,绽放出鲜活的生命。

尼采说过:“宗师只有一大弟子,而此子将背其师,盖渠亦必自成大宗师也。”谨以此语祝福《思想拷问》。

导 言

从世界政治史的角度,若说19世纪是殖民主义在东方登峰造极的世纪,那么20世纪则是亚非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而在亚非民族主义这股浪潮后面推波助澜的,就有后来成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国家20世纪上半期都曾与中国有过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曾对它们寄予过很高的期望,并在过去的那个世纪的岁月中,曾经将它们当作中国的样板。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如此拨动或吸引亿万中国人的心弦与视线?显然,前者主要是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后者主要则是包含有国家平等、民族自决理念的威尔逊十四点建议和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20世纪这两种影响在中国较量的结果,无疑是前一种影响占了上风,成为历史的主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揭开了中俄关系史新的一页。苏维埃俄国乃至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联,在对华政策上,虽然仍存在着大国主义倾向,但与沙俄时代的侵略掠夺政策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基本上贯彻了平等互利与和平睦邻政策。而中国的统治者,特别是中央政权,由于社会制度的关系,对社会主义苏联常抱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态度;但也有不同的党派、军阀和政治势力,在一些特定时期,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并与苏联结成某种联盟。

从中国中央政府与苏联关系发展的整体上看,1917—1949年的中苏关系,从时间上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建交与提携(1917—1927)

苏俄早在1917年11月公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文件——《和平法令》中,就确立了放弃侵略、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针。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两次对华宣言,进一步明确声明要将沙俄时代掠夺中国的“一概送还中

国”，而“不受何种报酬”。^[1]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开始是对苏俄采取敌视和封锁的政策。但迫于国际和国内（五四运动影响）的压力，其对苏政策也逐渐朝着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方向发展。如从1920年6月份起，就先后在莫斯科设立了总领事馆、停付旧俄代表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终止旧俄驻华使领馆待遇、同意中苏互派使团进行谈判等等。此后，两国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并着手进行解决“悬案”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虽然双方在谈判时又经历了不少激烈的争执和令人不安的曲折，但最后还是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包括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等内容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等，从而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2]

在1924年中苏协定涉及的重大问题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外蒙问题。它一直是旧中国与苏联发展关系的重大障碍之一。沙俄从18世纪开始向外蒙渗透，到中国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导演的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一小撮外蒙王公、喇嘛对北京中央政府闹独立和“自治”。但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外蒙傀儡政权因靠山垮台而不能自立，故又于1919年1月呈文中华民国大总统，主动请示取消“自治”。可1920年9月，又有俄国远东地区谢苗诺夫白匪一支残余部队，在恩琴男爵率领下窜入外蒙，扶持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了外蒙的第二次“独立”。后来苏俄红军进行军事干涉，虽消灭了恩琴白匪，但却在外蒙建立了一个“君主立宪政府”。1921年11月苏俄与之订立所谓《苏蒙友好协定》，宣称外蒙为“独立国家”，而苏军则被“请求”驻留外蒙维持其“独立”。通过长时间的激烈争执而签订的1924年中苏协定，苏方虽然还是承认了外蒙为中国领土；但实际上，苏联以后并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许多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仍呆在外蒙。尤其是苏联的乌里雅特蒙古族官兵亦一直打着外蒙部队的番号驻留蒙古，^[3]支持外蒙在事实上脱离中国。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军又根据1936年3月签订的《苏蒙互助议定书》，大规模开入外蒙。1941年4月13日，竟又在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中，声明与日本相互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与其在1924

年中苏协定中的立场相去愈来愈远,到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附件中,为了能保证苏联支持其统一中国的大局,不得不屈从于苏美英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安排,以委婉的方式,有苦难言地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即表面上是以“公民投票”决定了外蒙的命运。^[4]

20年代初在努力与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建交的同时,苏联及共产国际还积极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建党,并在理论,方针和政策上多方面给予指导。此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密切。尤其是,苏联还与中国南方的孙中山革命政府建立了同盟,互相提携。在苏联帮助下,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苏联继续积极援助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提供了大量武器和装备,并派遣了以鲍罗廷和加伦将军为首的共135名政治和军事顾问到南方革命政府和军队以及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服务。^[5]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逆流,苏联、共产国际的政策又迅速向左转。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以及王明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几度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纠正了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敌对与中立(1927—1937)

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苏联与中国南北政府的关系均迅速恶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到6月初,武汉政府亦解雇了苏联顾问鲍罗廷。12月中旬,南京国民党政府借口广州起义与苏联有关,封锁了苏联领事馆,并发布了与苏绝交令。奉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虽声称“不必与南方苟同”^[6],而未与苏联中断使领关系;但敌视的态度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早在1927年4月6日,奉系军警就搜查了北京苏联大使馆以及苏联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拘捕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使馆的中共领导者李大钊等人。苏联为了报复,则在远东沿海州也开始扣留华侨,并拒绝华人入境。到1928年2月底,驱逐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华侨已达3100多人。^[7]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式成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因而也就承继了以前由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此后由于中东路问题,使这种关系完全断绝。中东铁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沙俄出资,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修筑的。后由沙俄控制了铁路的经营权,并攫取了铁路附属地的行政、司法、驻军等特权。十月革命后,一直到1921年2月,除铁路经营权由包括中国和旧俄白卫分子在内的“国际共管”之外,铁路附属地的行政、司法以及军警权等实际上已被中国收回。

在中苏两国有关建交和解决悬案的谈判中,苏方代表否认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曾有过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表示(在中国最早见到的宣言文本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法文电讯,其中载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字样;^[1]但1919年8月16日苏联《消息报》正式公布的宣言文本,确实又没有无偿归还的内容。^[8])经激烈争执后所签订的1924年中苏协定,中国对此作了让步,同意了苏方提出的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要求。但由于以后在铁路管理问题上中苏存在着矛盾以及双方权益实际上的不平等,加之后来蒋介石的纵恿,1929年7月,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苏联开始是宣布中苏断交,进而出兵击溃了张学良的东北军,迫使张学良又恢复了中东铁路的中苏共管状态。可是“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却不顾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对,从1933年6月开始,与日本和伪满洲国的代表进行“让售”中东铁路的谈判。结果以14000万日元的价格(另付苏联职工退职金3000万日元),非法将中东铁路及其全部附属财产“让售”给日本人。^[9]

以后,中东铁路的历史理应与苏联完全无关;可苏联后来又竟以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向美英要求“恢复”其在中东铁路上的“优越权益”;而按苏美英三巨头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交易,通过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认可,中东铁路加上沙俄时代就已失去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以后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及旅顺、大连两个港口又回到了苏联手手中。用斯大林的话说:“这是为沙皇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洗刷了奇耻大辱”。^[10]

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从而迫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有求

于苏联。这样,使其不仅在外蒙和中东铁路等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软弱,而且基本上停止了对苏联一贯的敌视政策。如1934年以杨杰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请求赊购苏联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及飞行员援华;后1935—1936年,国民党政府又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以求得苏联的援助。但是,苏联对中日冲突的最初反应是“严守中立”。虽然以后在1932年12月,因中方的努力两国宣布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苏联因怕惹火烧身,并对蒋介石的诚意有所怀疑,故在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是采取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虽然对远东局势一直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忧虑,但苏联官方的言行均极为审慎。对日本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主要是从道义上表示谴责或同情,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三)一致与联盟(1937—1945)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以后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提供了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加上德、日1936年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反苏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因此,苏联不能坐视日本法西斯对苏联远东安全的威胁,从而逐渐放弃了“严守中立”的态度。

“七·七”事变后不久,苏联就与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开始从物资和人力上全面援助中国抗日。到1942年,苏联政府先后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三笔总金额达2.5亿美元的易货援华低息(3%)贷款,用以向苏联购买军火。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通过从土西铁路萨雷奥捷克站,贯通中国新疆直至甘肃兰州的公路运输线,以及阿拉木图——哈密的航空线,源源不断地给中国送来了包括904架飞机、1140门大炮、82辆坦克在内的大批军火。^[12]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下,到1939年初,苏联政府派遣了5千多名军事顾问、教官和飞行员与中国军人并肩战斗,其中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外,在1938—1939年,苏联的航空学校为中国培养了1万多名航空技术人材,其中有1045名飞行员;而在中国国内有苏联顾问和教官任教的各级军校,培训了约9万名中国军人。^[12]也是在这

一时期,苏联红军与日军在中苏和中国与外蒙边境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间接援助了中国的抗战;同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是成功制止日本法西斯“北进”苏联战略计划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使中苏之间这种一致性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中苏联盟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给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击,则加速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当然,如前所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有条件的。而且参战后还并不满足已经获得的权益。苏联军队利用占领中国东北之便,拆下了大批机器设备运回苏联,使当时中国东北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由美国以及国民党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估计,苏联的拆迁和因拆迁造成的经济损失共约20亿美元)。^[13]

与历届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东北地方政府长期同苏联敌对的情况相反,新疆的中国地方政府,如杨增新和盛世才政权,却基本上与苏联保持了正常往来乃至比较友好和合作的关系。这样使苏联感到其与新疆的边境有了安全保障。也使新疆避免了所谓“外蒙第二”的危险;并曾先后两次获得苏联提供的共750万卢布的贷款,^[14]促进了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之成为全国抗日的一个重要后方基地。

(四)协作与谅解(1945—1949)

抗战胜利后,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需要苏联支持其统一中国;另方面是由于苏联为了确保雅尔塔体制下的远东和平以及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获得的权益,因此双方在总体上都比较忠实地履行条约及自己所作过的某些许诺,相互之间始终能比较协作,容忍与谅解,维持了至少是表面上正常的外交关系。

当然,苏联政府在不明显违背中苏外交关系和条约的大局下,并不妨碍其对中国的国共两党行“中庸之道”,即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如一方面将中国东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交给国民党。但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东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将缴获的日军一部分军火有意留给了共产党;甚至拖延或

突然提前从东北撤军，给国民党接收东北制造种种障碍（如反对国民党经大连运兵，把营口、葫芦岛和榆锦铁路先故意交给中共等）。

以后，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日益明朗，苏联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转向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制约美国在华势力的膨胀。1948年1月，斯大林派米高扬到中国，与中共领导人商讨新中国建国及苏联援助等事宜。到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表示了以前对中共的“干扰”和“妨碍”的“内疚”，并建议中共尽快建立政府。“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15]这样，中共中央即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就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苏联政府即通知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宣布与其断交。从此，中苏关系又揭开了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1917—1949年的中苏关系，虽然短暂的正常外交往来乃至联盟关系时有所现，但多处于不正常状态。中苏关系始终存在三大隐患：一是受帝国主义和中外反动势力国际性的反苏反共政策的制约；二是受外蒙问题的冲击，三是因苏联在华权益（旅大海港、中东铁路）引起的争端。由于旧中国实际上始终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和统一，因此，象中苏边界这样本来比较重要的问题，被限制在苏联与中国地方实力派这样有限的关系上，因此显得并不突出。不过，让人深思和觉得有趣的是，国民党及其政权与革命斗志和阶级意识向来强烈的苏联共产党人之间虽数度反目成仇，但却两度获得过苏联大量物质和人力上的支持；而心心向往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国际兄弟，从苏联那里得到的却多是马列主义思想，很少有物资支助。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因社会制度不同所生隐患自然消息，外蒙问题、中东路问题也通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妥善解决。从此，中苏关系有可能在全新的基础上获得发展。但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关系，竟然比昔日中苏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要紧张、还要剑拔弩张。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十月革命与中国	(1)
第一节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1)
第二节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12)
第三节 瞿秋白的俄苏情结	(19)
第二章 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33)
第一节 中共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33)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苏联政府的对华军事援助	(42)
第三节 苏联顾问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47)
第四节 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	(58)
第三章 中苏邦交的建立、中断和恢复	(68)
第一节 中苏外交关系的建立	(68)
第二节 中苏两国政府关系的恶化及邦交的中断	(82)
第三节 中苏外交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92)
第四章 苏联与中东铁路的历史变迁	(105)
第一节 苏联出售路权之前中东路的历史沿革	(105)
第二节 苏联向日伪出售中东路及以后路权的变化	(112)
第五章 苏联在外蒙独立中的作用	(126)
第一节 恩琴白匪逃窜外蒙与苏俄出兵干预	(127)

第二节	外蒙成为苏联东方的“卫星国”	(130)
第三节	苏联背景下的外蒙“独立”与南京政府的承认	
		(134)
第六章	苏联与新疆地方的关系	(141)
第一节	杨增新联苏打击白俄避免新疆成“外蒙第二”	
		(141)
第二节	金树仁强调新疆特殊保持与苏联的正常关系	
		(146)
第三节	盛世才亲苏获援统一新疆并借以巩固其统治	
		(149)
第四节	苏联与中共在新疆的活动	(153)
第五节	苏联与三区革命及新疆的和平解放	(156)
第七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	(162)
第一节	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目的	(162)
第二节	苏联志愿者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168)
第三节	抗战时期中苏之间的经济关系	(176)
第八章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86)
第一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86)
第二节	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对中共造成的消极影响	
		(190)
第三节	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	(194)
第四节	苏联与中共的建国准备	(201)
结语		(208)
近代中苏关系史大事记		(216)
后记		(241)

第一章 十月革命与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反过来有中国因素在十月革命的非凡历程中留下了深的痕迹。

第一节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在俄国十月革命及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斗争中,尚不能确知有多少国际战士与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起并肩战斗。但在成千上万国际主义者的群体中,旅俄华工无疑是其中的主力和中坚。

一、旅俄华工的觉醒和参加十月革命

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大约有50万以上的华人在俄国。^[1]华工赴俄最早是在19世纪60年代,比赴欧洲和南洋的华工要晚得多。他们是伴随沙皇侵占中国领土和清政府的锁国政策破产以及俄国在远东地区大量招募华工而出现和不断增加的。他们多来自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和湖北等省,其中以山东人最多。

十月革命前的旅俄华人,基本上是一些为生活所迫而离开祖国去谋生或寻求幸福的中国下层民众。称他们为华工,实际上他们既不同于我国古代出国卖艺的工匠和小贩,也不同于现代的产业工人,同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侨民。因为他们是“在国外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奴役,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中国人。就其阶

级内容来说,华工是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份,它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与掠夺中国的产物。”^{[2](P1)}

旅俄华工在十月革命前大多分布在穆尔曼斯克铁路、乌拉尔矿山、顿巴斯煤矿和白俄罗斯、卡列里的林场及彼得格勒、叶卡捷琳堡、敖德萨、卢甘斯卡、马里乌波尔等地的工厂中做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中国无产者还在靠近北方、西方、西南方及罗马尼亚、高加索战线的前线阵地上充当民兵以及伐木、筑路和修筑防御工事的民工。这些华人“在俄国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残酷。他们每天工作 12 小时,没有休息和节假日,生活在土窑和木房中,不能享受起码的医疗服务,而获得的工资却比俄国工人少 20—30%”。^[1]

旅俄华工从事的许多工作和享受之待遇,都是俄国和日本工人不愿意接受的。如修建俄国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时所招募来的俄国工人,大多因吃不了苦而逃走,要么要的工资很高。所以当局最后决定全部使用中国苦力和本国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罪犯。在俄罗斯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有:“组织中国人做工,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和任何困难。中国人无论对土方工程,还是对房屋建造,全都习惯,因此筑路工程对他们说来也毫无不习惯之处”。^[3]做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享受最低劣的待遇——在俄华工普遍面临这种悲惨的处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国家招募和私人企业招聘的华工人数更多,处境也更恶劣。并且其招募或招聘纯属欺骗和拐卖。华工抵俄后,俄方根本不履行合同,任意改变务工地点和工种,甚至将成千上万的华工违约送到西部战线去当炮灰,有的则被转卖。

这是西方殖民者 16 世纪开始的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的“猪仔贸易”的重演。许多中国官方保存的外交档案中,都有许多关于旅俄华工诸如“褴褛不洁,形如乞丐”,“鸠形鹄面……褴褛寒冷,状难忍睹”的凄惨描述。^[4]并且,现在已无法统计死在资本家的皮鞭和哥萨克军警的屠刀下以及充军死在前线的华工到底有多少了。所有这一切,也就是旅俄华工踊跃参加十月革命和保卫十月革命成果斗争最深刻的历史和阶级根源。了解这些情况,对旅俄华工参加俄国革命人数之多,战斗之英勇也就不感奇怪了。

在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影响下,旅俄华工的阶级和团结意识不断觉醒。列宁关于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在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时期就已深入到一部分欧俄华工的心中。他们响应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号召,同俄国工人阶级一起,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此后像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巴库、叶卡捷林堡、彼尔姆等城市的华工又站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一边,加入反战和平示威游行队伍之行列,同俄国工人阶级一道,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到 1917 年 7 月以后,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领导下准备进行武装起义的时候,许多华工又同俄国工人阶级一道声援布尔什维克。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热情地欢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

为了能让中国的劳动者理解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政策和十月革命所实现的根本性转变,俄共(布)还有针对性和有意识地在他们中间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宣传。旅俄华工齐杨威回忆说:“一开始我们弄不清激动俄罗斯的事件,但是后来就懂得了。出现了用中文写的传单,宣传员也常到我们这里来……宣传员说,布尔什维克是